

中国文化从刊

与

章开沅 主编
马 敏

基督教

中国教会大学诚然是与西方殖民主义相伴而来，并且其初始阶段又主要是为基督教的传播服务。但到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中国教会大学不能不作相应的自我调适，经过本土化、人同化、学术化的艰苦历程，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教会大学曾经具有较高的成就与国际地位。他们与非洲的教会学校相比，显然处于较高的层次；与印度的教会大学相比，为数虽较少而质量则较高；与日本的教会大学相比，则具有较强的与公立大学竞争的实力，因为他们在医学、农林、法学、商学、社会学、新闻学、图书馆等学科领域，都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

章开沅 马 敏 主编

第三辑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 第3辑/章开沅,马敏主编.
-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ISBN 7-5351-2634-0

I. 基… II. ①章… ②马… III. ①基督教 - 研究②
宗教文化 - 中国 - 研究 IV.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481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83625580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襄樊日报印刷厂

(441021·襄樊市襄城区东街 76 号)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4 插页 15.5 印张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8? 千字

印数:1 - 1 500

ISBN 7 - 5351 - 2634 - 0/G · 2142

定价:28.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主 编 章开沅 马 敏

编辑委员会	章开沅	马 敏	王奇生
	周洪宇	何建明	史静寰
	陶飞亚	徐以骅	刘家峰

本书出版得到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 (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 的
赞助，特此感谢！

目 录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盛衰	徐以骅(1)
《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章开沅(77)
《圣经》方言译本书目考录	游汝杰(80)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融和	
——谢扶雅先生对中西文化沟通的贡献	吴梓明(132)
赵紫宸早期的本色神学评析	
——寻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邢福增(147)
近代中国佛门的基督教观	何建明(169)
失败的尝试:关于三四十年代中国天主教会传教方式探讨的思索	秦和平(181)
论狄考文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史静寰(204)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科学观	胡卫清(217)
农业改良与农村社会变迁	
——抗战前金陵大学农学院安徽和县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研究	张 剑(261)
抗战时期于斌事功论略	牛淑萍(302)
调适与冲突:1950年前后的教会大学	
——以齐鲁大学为个案	刘家峰(321)
贝德士与费正清来往信札	王薇佳译 章开沅说明并校(336)
传教士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1936—1939)	
.....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著 鲁娜译	(368)
文华三重纪念	阿瑟·M·舍尔曼著 陈新祥译(407)
中日战争对美国在华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影响(第一部分 总论)	盖伦·M·费舍编辑 刘家峰译 章开沅校(415)

Conten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llege of Religion at Yenching University ...	
.....	Xu Yihua
Preface for <i>A Series of Books on Histor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Christian Colleges</i>	Zhang Kaiyuan
Study on Catalogues of Translations of The Bible in Chinese Dialects	You Rujie
Blending of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Mr. Xie Fuya's Contribution to the Link between Chinese-Western Cultures	Wu Ziming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n Zhao Zichen's early Indigenous Theology: Search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	Xing Fuzeng
Modern Chinese Buddhism's Viewpoints on Christianity	
.....	He Jianming
A Failed Trial: Reflection on the Discussion of Chinese Catholic Churches' Way of Missionary Work in the 1930s and 1940s	Qin Heping
Calvin Mateer's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	Shi Jinghuan
Modern Missionaries' Viewpoints on Science in China	Hu Weiqing
Agricultural Reform and Change of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Study on Wujiang Agriculture Extension Area in Hexian County, Anhui Province ...	
.....	Zhang Jian
Minister Yu Bin's Main Activitie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Niu Shuping
Adjustment and Conflict: Christian Colleges before and after 1950—A Case Study on Cheeloo University	Liu Jiafeng

Letters between M.S. Bates and J.K. Fairbank

Translated by Wang Weijia, explained and proofed by Zhang Kaiyuan

A Missionary's View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 Fox Butterfield, translated by Lu Na

The Boone Library Translated by Chen Xinxiang

The Effects of Sino-Japanese Conflict on American Education and Philanthropic Enterprises in China..... Edited by Galen Fisher, translated by Liu Jiafeng, proofed by Zhang Kaiyuan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盛衰

徐以骅

作为中国第一所基督教神学研究院，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在中国高等神学教育领域，曾居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被誉为远东第一流的神学教育机构，在燕京大学内，宗教学院是燕大最早成立的学院，为该著名学府“作为一所教会机构攸关重要的组成部分”，^①在大学事务中亦曾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素以学术自由著称，为中国基督教自由派神学之重镇；该院又以学术研究为号召，竭力网罗学术精英，其师资阵营，堪称一时之选，故使其在建院不久的短短数年后，一跃而为中华基督教神学教育之翘楚。

然而，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迅速发展之后，这所显赫一时的神学高等学府，却盛极而衰。在生员短缺、经费支绌等多方压力下，其昔日雄心勃勃的发展蓝图为挣扎图存的权宜对策所取代，而其“梦幻组合”之教员队伍亦随之离散飘零。在大学事务中，学院的地位也日见式微，由于燕京大学向中国政府立案，宗教学院虽然在地理上和逻辑上仍为大学之一部，但在校章上已属编外，故早年“院校分离”之议，渐趋激烈，以致酿成学院与大学

^① 司徒雷登致葛思德函 (J. Leighton Stuart to B. A. Garside), 1933 年 11 月 2 日, 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rchives, 下简称联董会档), Reel 189 (缩微胶卷号), 第 544 页。

及差会的公开对立，院校的从属关系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燕京大学是在华教会大学中最大和最受人关注的学校，然而对其宗教学院，则尚缺较深入的研究，这与该院当年在大学中的地位，是颇不相称的。^① 学界对宗教学院的名教授们，如刘廷芳、赵紫宸、吴雷川、徐宝谦、洪煊莲等，皆耳熟能详，但对宗教学院的具体发展和内部运作，则所知有限。其实，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由盛转衰，也折射出了中国教会大学神学教育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本文便是通过对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个案研究，以期对教会大学在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更充分的认识。

对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作出最大贡献的，当推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刘廷芳、赵紫宸三人。司徒雷登身为燕大校长，是燕京神学教育政策的奠基和决策者；刘廷芳作为第一任华人院长，是宗教学院的设计和组织者；任宗教学院院长逾廿载的赵紫宸，则是宗教学院的标志和灵魂。

司徒雷登是1919年6月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在此之前他在中国宣教事业中的主要经历，均与神学有关。1904年他加盟

① 事实上连有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介绍和回忆文字也很少，笔者所见的主要有刘万芳：《燕京大学神科》，载《生命》第2卷第2期（1921年9月），第1—9页；张仁济：《忆燕京宗教学院》，载《展望月刊》第6卷第6期（1963年6月），第12—13页；刘廷蔚：《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载董鼎编：《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48—52页；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64年版，第106—128页，赵在文中提及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1952年结束到赵作此文，几近十年，因而此文当作于1962年左右。

金陵神学院，任新约和希腊文教授，著有《环球布道小史》、《希腊文初阶》、《希华英辞典》、《启示录新释》等著作，逐步建立起神学和教会教育家之声誉。^①

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后，中国神学教育之落后尤其是大学生不愿入神学之现象，开始受到关注。作为中华学生志愿传道运动“最热心的支持者”，^②司徒雷登早在1913年便指出：“在中国基督教运动目前的阶段，最主要的问题是获得和供给有充分训练之本地领袖……宣教事业的最后成功有待于对政策的重大调整和重心的转移。”^③1913年中华续行委办会特设神学教育委办以研究神学教育之改进，司徒雷登于1916年出任该委办之署委办长，在该委办当年的年度报告中提出“造就牧才，乃宣教事业之冠冕”之主张。^④除1917和1918年担任神学教育委办秘书外，从1919年起司徒雷登便一直是该委办的委办长，成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界的领袖人物之一。

在司徒雷登的参与和主持下，神学教育委办开始研究教会大学在神学教育中的作用，并且把培养圣工作为衡量教会高等教育机构成功与否之尺度，对教会大学提出越来越严厉的批评，要求其回归为教会提供所需教牧人才的本旨。司徒本人还参与中华续

① 司徒雷登的生平事迹可参邵玉铭：《一个美国在华宣教士：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Yu-ming Shaw,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魏思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司徒雷登著、闻人峻译：《在中国五十年》，香港求精出版社1955年版；刘廷芳、谢景升：《司徒雷登年谱》，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25页。

② 前引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第36—37页。

③ 司徒雷登：《教牧人员的教育》（*Education for the Ministry*），载《中国差会年鉴》（*China Mission Year Book*）（1923年），第225页。

④ 《神学教育特委办的报告》，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6年），第14页。

行委办会主持完成的中国基督教事业调查和巴敦调查团对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调查，两次调查报告的神学部分，均对中国神学教育的现状作了后被广为征引的直言不讳的批评。^①

为解决中国传道人才不足问题，司徒雷登在金陵神学院任教期间，便提出了罗致人才、筹措经费、整顿神学、注重立志传道团、取法基督（即注重造就本地领袖人才）、规定薪金等六大主张，而其中整顿神学、筹设完善之神学教育，更被司徒视为“今日当急之图”。^②司徒雷登参与并领导的神学教育委办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华教会得人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神学教育程度之低浅，因此该委办早在1914年的报告书中，便有在中国设优级神学之议，俾全国传道人士，可得高深之神学教育。鉴于当时各地神学校数过多，人员设施亦多缺乏，故力主通力合并一二规模宏远之神学，以求结实雄厚的力量。司徒雷登后来还一再表示，与其敷衍多数不完善之神学，不如集合全国之神学校，择一合宜地点，共同组织一完备之大学神科。^③司徒雷登从其切身的经历中，确信神学教育的落后，是大学生不愿从事教牧事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就任燕京大学校长后不久他曾写道：“中国的环境正在发生迅速变化，对中国高级教牧有一种紧迫的需要。大学生对

① 司徒雷登：《神学教育》，载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蔡咏春等译：《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7年，第930—933页；《神道教育》，载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44—159页。关于此两次调查对中国神学教育的批评，可参拙文《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载林治平主编：《台湾基督教史——史料与研究回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宇宙光传播中心1998年版，第397—424页。

② 彭长林：《当今中国教会对于传道人才问题》，载《神学志》第5卷第2号（1919年6月），第1—10页。

③ 《神学教育委办主席初步报告》（Tentative Report of the Chairman of Committee on Theological Education），载《中国差会年鉴》（1915年），第429页。

教牧事工考虑甚少的一个原因，是神学教育不能向他们表明何为真正的圣功，亦常常得不到他们的尊重，而去适应受较少教育者。结果我们较大教会学院的优等学生，看不到教牧圣功所示之宏远前程，转去考虑其他选择。”^① 1921 年在其主持下的神学教育委办在最后一份年度报告中亦曾指出：“除非我教会中的各神学，能彻底改良，聘任通才，增高程度，使青年人明白牧职之重要，圣工之伟大，谙悉牧职之意义，和圣功之价值，我们是不能怪教会大小学校中上等人材不入神学的。”^②

司徒雷登受命执掌燕京大学，确实为他多年来形成的基督教教育理想之付诸实践，提供了更大的活动舞台；而汇文大学神科的基础，京都首善之地的人文环境，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亦为他推行其“模范神学计划”，酿造了充分的条件。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在中国神学教育界的异军突起，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多种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成立于 1915 年的汇文大学神科，是地处北京、天津、通州三地的若干圣经和神道学堂多年发展合并的结果，其核心是汇文大学神学馆（亦称神道学科正班）和华北协和道学院，两院均为华北地区神学教育的中心。^③ 汇文大学神学馆脱胎于美以美会在北京设立的怀理书院和英国循道公会在天津所设之圣经学堂，两校于 1912 年联合；成立于 1905 年的华北协和道学院则由美国公理会著名教士谢卫楼（D.Z. Sheffield）设于通州的潞河书院发展而来。此两神学于 1915 年合并，当时商议合并的出力人

① 司徒雷登致罗宾逊（G. L. Robinson）函，1919 年 11 月 22 日，联董会档案 186，第 811 页。

② 司徒雷登撰、刘廷芳译：《中华续行委员会特设讨论神学教育委员会报告书》，载《金陵神学志》第 7 卷第 2 号（1921 年 6 月），第（7）2 页。

③ 关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由来可参《燕京大学宗教学院 1925 至 1926 年简章》（Yenching University, the School of Religion Catalogue, 1925 - 1926）（1925 年 4 月）。

物，如刘海澜（Hiram H. Lowry）、厚巴德（W. T. Hobart）、万卓志（George D. Wilder）、方泰瑞（C. H. Fenn）、甘霖（George T. Cardlin）、金修真（Thomas Biggin），均为华北地区神学教育的耆宿。1918年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合并，正式成立燕京大学，汇文大学神科亦随之改称燕京大学神科。该科是由公理会、伦敦会、美以美会、北长老会组成的跨宗派联合机构，^① 颇合司徒雷登多年来主张之合办优级神学的理想。

其次，北京向为学术渊藪，人才荟萃，“时代思潮之领袖，如陈独秀胡适之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杜威罗素之流，荟集北京，极一时之盛。”^② 在基督教知识界，1919年便有“北京证道团”的成立，其宗旨强调传播基督教“必得接近今科学、哲学的概念，解除现代人种种的误会及疑惑”，故证道团“一方面要证明基督教如何与时代的精神相适应，并如何足以当时代的先驱；一方面要坦白的讨论教会内部的各种问题，作革新教会的准备”。^③ 1924年证道团易名“生命社”，它不仅为燕京大学基督教教育的实践提供了理念，而且成为沟通基督教界与北京乃至全国知识界的渠道。证道团和“生命社”的发起人和中坚分子，多有燕大教

① 参阅谢卫楼：《汇文书院及道学馆》（The North-China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载《教务杂志》第26卷（1895年5月），第224—228页；芳瑞泰：《华北地区的神学教育》（The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North China），载《中国差会年鉴》（1910年），第235—239页。

② 徐宝谦：《二十年来信教经验自述（三）》，载《真理与生命》第8卷第2期（1934年4月），第80页。

③ 关于“北京证道团”的成立和宗旨，参见徐宝谦：《北京证道团的宗旨及计划》，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1年），第133—134页；赵紫宸：《中国基督教复兴：北京证道团的宗旨》（Christian Renaissance in China: Statement of Aims of the Peking Apogetic Group），载《教务杂志》第51卷（1920年9月），第638页。

授。^① 作神学亦需要学者们互相砥砺的学术空间和氛围，赵紫宸在许多年后便称：“一个作神学思想的人，在大学里没有同志同行，膈臆难诉，疑义莫析。专心读书则全为西洋学术所笼罩，与西国传教士们议论，则受益不多，无以越篱樊而翱翔。”^② 赵氏1926年放弃母校东吴大学前程而加入燕京，向往京城学术环境及联合同道建立神学团契，不失为一个原因。

再次，北京为新文化运动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大会，又引发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所有这些思想、文化和政治运动，对教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促使基督教界作出深刻的反省。刘廷芳便称新文化运动“是主赐教会的一大机会”，教会必须“速速先自反省，应当先自改良”。^③ 赵紫宸亦视非基督教运动为“上帝廓清教会的工具”。^④ 教外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固然刺激中国教会“自修以止谤”，^⑤ 亦牵动诸如北京证道团倡导之“基督教新思潮运动”的正面回应。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加强，便有应对各种社会思潮冲击的背景。1924年3月21日刘廷芳在给司徒雷登的信中报告说，自司徒离华返美后，“关于人生观论战的文章铺天盖地，中国的主要知识分子如胡适等均参与这场全国性的论战，甚至青年会的干事也跑来责怪我们为何不予以

① “北京证道团”及“生命社”与燕京大学的关系，可参前引《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第16—88页。

② 赵紫宸：《漫谈神学》，载《真理与生命》第14卷第3期（1949年10月），第7页。

③ 刘廷芳：《新文化运动中基督教宣教师的责任》，载《生命》第1卷第9、10期合刊（1921年5月）。

④ 赵紫宸：《敬致全国中国基督徒书》，载《真理与生命》第2卷第4期（1927年3月1日），第81—93页。

⑤ 刘廷芳：《基督教在中国今日当如何自修以止谤》，载《生命》第6卷第2期（1925年11月），第3—16页。

反击。但我们均陷于日常事物而无暇治学，有何反击可言？”刘认为燕京神科最弱的部分是缺少针对知识阶层的现代护道学，故不适应时代之需要。^①

司徒雷登在大手笔地勾勒燕京大学宏伟发展蓝图的同时，亦在其中为其向来主张建立的一所全国第一流的神学研究院留有显著的位置。1926年他曾撰文表述他对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愿望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对燕大最大的梦想之一就是它将拥有一所宗教学院，在其中越来越多的既熟谙本国崇高的历史遗产，又受过西洋最好神学教育的中国籍教员，将本着他们自身的宗教经验，向本国人民讲授真正的基督教，务求其合于20世纪的知识 and 中华民族的精神，同时亦把一切由西方历史因袭而来的无用之附加物，悉数扫除。”^②

然而，司徒雷登之“模范神学”计划，虽得天时地利，却乏人主持。汇文大学神科自1915年以来，一直由美以美会教士厚巴德主持。然厚巴德已近退休之年，还要兼管本公会之圣经学校，照司徒雷登看来，他“对实际宣教比对神学研究更感兴趣，很想从此种他所力不从心的职位上退下来”。^③至于接替之人，司徒原属意另一开科元老、美国北长老会教士欧格非（C. L. Ogilvie）。同司徒一样，欧氏亦有在中国建立一所堪与美国最好神学院相媲美的一流神学院的抱负，然1919年底他因肺炎而去世。其余由合办差会所派遣之教员，如甘霖、万卓志、金修真、

① 刘廷芳致司徒雷登，1924年3月21日，联董会档卷184，第5—6页。

② 司徒雷登：《教会教育在中国的将来》（*The Future of Missionary Education in China*），载《中国学生月刊》（*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第21卷第6期（1926年4月）。此文曾由林瑞铭译成中文，载《真理与生命》第2卷第3期（1927年2月15日），然此段译文为笔者重译。

③ 司徒雷登致路思义（Henry W. Luce）函，1921年3月13日，联董会档卷186，第901页。

费克礼 (Carl A. Felt)，不是兼职太多，便是难以胜任，故司徒上任之初，神科虽是燕大最早然而也是“最弱”的一科，师资短绌，士气低落。司徒 1920 年 3 月 13 日在给正在美国为燕大筹款的路思义 (Henry W. Luce) 的信中写道，燕京神科“目前教育水准如此之低、神学生如此不满或至少缺乏热情，完全不能吸引热忱和受良好训练之文科学生（主要由于师资欠佳），以至我无勇气在本校宣扬教牧事工，或在中国其他地方为神科做广告。”在此种情况下，司徒本人不得不在神科一周授课 12 小时以维持局面。^① 燕京大学神科的此种局面随刘廷芳博士的到来，才逐步改观，从而呈现一种“膨胀的势力”。

二

刘廷芳 (1892—1947)，浙江永嘉人，系第三代基督徒。^② 刘自称从中学起便对中华教会的本色化发生兴趣，而且不满差会的某些做法，故对“一般西教士持布尔什维克式的态度”。^③ 早年刘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3 年赴美留学，先入乔治亚大

① 前引司徒雷登致路思义函，1920 年 3 月 13 日，第 920 页。另参见司徒雷登致惠勒 (R.W. Wheeler) 函，1920 年 11 月 20 日，联董会档卷 186，第 994—995 页。司徒雷登在该函中称：“关于我们的神科，由于失去了欧格非和威显理，目前实在太弱甚至不能吸引本校文科的学生，我也无胆量到别处招收学生。”

② 关于刘廷芳的传记资料较少，且不完整，主要可参见包华德 (Howard L. Boorman) 编：《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第 2 卷，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416—417 页；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38—245 页。

③ 刘廷芳：《训练中国教会未来的领袖》(Training of the Future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hurch)，载《教牧杂志》第 52 卷 (1921 年 3 月)，第 160 页；刘廷芳：《使中国基督教会本色化》(Making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a Indigenous)，载《教务杂志》第 35 卷 (1922 年 5 月)，第 299 页。